

※俄蘇東方學系列之阿列克謝耶夫專輯：「新」中國批判※

墮落退化的與革命進化的中國文化

阿列克謝耶夫*著 陳相因**譯

編輯前言***

這篇文章的手稿的原文有另一個名稱：〈中國的平庸鄙俗與革命進化〉(Пошлость 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時至一九三五年，某位對阿列克謝耶夫懷著同情與友好的人士說服他更改名稱。阿列克謝耶夫是個能敏銳地預知種種災難的人，他在一九一〇年已經寫下這些災難將使「一切充斥著平庸鄙俗」(всё поглощающая пошлость)〔譯者註：以下簡稱「庸俗」〕的觀點。但是，早在那之前或者之後，「庸俗」在他的字典裏總有廣義，絕非普通貶義的庸俗生活或行爲；他是在社會與歷史的範疇裏意識到庸俗下流。也因此，他決定讓論文標題改爲更具廣義的想法，而非保留因時代所帶來的危險性名稱¹。或許，許多人可能會這麼說，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或同時所作

* 阿列克謝耶夫 (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俄羅斯與前蘇聯漢學家、哲學家與翻譯家，全蘇聯科學院研究員、院士。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

*** 本文編輯為班科夫斯卡雅 (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1927-2009)，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研究員。責任主編為李福清 (Б. Л. Рифтин, 1932-2012)，俄羅斯與前蘇聯漢學家、全俄羅斯聯邦科學院研究員、院士。

¹ 譯者註：自 1924 年列寧逝世後，史達林在蘇聯共產黨黨內先後展開與托洛斯基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1879-1940)、季諾維也夫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加米涅夫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 1883-1936) 與布哈林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 1888-1938) 的激烈鬥爭。當中，雙方相互辯論與攻訐對方時，常見“пошлость”一字，英文通譯爲“banality”。例如：1931 年托洛斯基曾批判史達林所著的《列寧主義問題》，是「思想垃圾的一部法典，是一本思想偏狹的官方教科書，它集平庸鄙俗於一身」。詳見 Leon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Results and Prospects* (Seattle: Red Letter Press, 2010), p. 178。中文譯本可參閱列夫·托洛斯基

的論文是這種寫法，但僅做到最小範圍內的變更。

一九二六年夏天，阿列克謝耶夫此生最後一次去中國，此後他便無法再如他所願地進入中國或是歐洲。他太過明瞭自己的旅行對於漢學志業的必要性，卻也正如他始終不能明白自己何處阻礙了他們²。

一九二七年二月在俄羅斯地理協會的全體大會上，所有人都聽取了正式成員阿列克謝耶夫教授的報告——〈新中國的歷史民族特色：一九二六年中國行之個人觀感〉(Новый Китай в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личные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деланные в поездке 1926 г.)。

阿列克謝耶夫的個人研究成果中所呈現的，是一位對中國古典文化有深刻鑑賞力的行家，同時也是學院派博學之士的觀察結論。其學術成果亦來自於從事科學考察的旅行家實踐(他在中國考察不只一次，分別是 1906-1909 年及 1912 年)。最後，其學術成就乃是源於他的為人；他是一個能夠被瞭解，而且即便處在最不同的學術或非學術的中國社群內，都能擁有獨特的思想見解。

保留下來的這一詳盡、儘管只是簡略報告的綱要底稿：在署名為報告的信封袋裏，裝有十九張寫得密密麻麻、不大的紙張，上頭寫滿了關於民族學、歷史與其相互關係的學術問題和批評，還有許多綜合與部分細節問題，涉及了新中國（1911 年革命之後）與歷史的舊中國之間的爭鬥。

從最初進入自己的學術工作開始，阿列克謝耶夫就已把注意力集中在新中國的研究議題上，儘管其主要方向是由遠古的中國古典文學著手。在革命後幾年裏，他不僅無法到中國，而且恐怕連取得一些必要的資訊都不可能。在悲嘆與盛怒這種由中國輸入不齊全的書報雜誌，且資料貧乏到簡直可恥，甚至無法從這些資料中擷取出什麼狀況之際，如阿列克謝耶夫所言，他仍盡其可能依自己的習慣來摘錄引文，將它們依照像是名稱與文題等方式分別放入文件夾中。例如，「現代中國的精神生活」(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жизн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新中國與它的文化問題」(Новый Китай и его 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新中國的政治希望與牢騷」

著，林驥華、伊陽明與范毓民譯：《不斷革命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頁 25。1934 年底，史達林利用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 1886-1934) 被刺身亡這一事件，在其後四年引發一連串的政治大清算。故當時對政治較為敏感者，會在 1935 年對阿列克謝耶夫提供改題的建言，是有其政治根據與背景氛圍的。

² 譯者註：指蘇聯境內的在上位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дежды и ламентации Нового Китая)、「重評新中國的宗教信仰與道德」(Переоценка религии и морали в Новом Китае)、「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宣傳」(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в Новом Китае)。由所有這些問題意識與方法論中得到一個概括的前提（這些資料同時也是爲了研擬一本專書）：「唯有擺脫了舊中國，才能論及新中國。但這談何容易。」儘管如此，這樣的困難對於通曉中國文化及其文化總體的阿列克謝耶夫而言，是力能企及且正合心意的。但，另一個問題卻是，被迫與自己研究的中國斷絕聯繫。

一九二六年的夏天，他穿越西伯利亞及蒙古來到北京，這一個半月的旅程對他而言充滿著多采多姿的生活印象。之後到上海，並「沿海路前往歐洲馬賽」。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不單是複雜而已，甚至有時候對於一個來自紅色俄羅斯的訪問者而言更是危險。阿列克謝耶夫首次在中國感受到眾人對他的警戒心。他在日記中寫道：「諸報刊登了關於槍決三位同情共產黨的報社記者的新聞，這就可理解爲何大家對我們都避之唯恐不及。」儘管如此，並非所有人都閃避，他們還是找到一些不懼怕的聯繫者，所以阿列克謝耶夫的手札小冊裏寫滿密密麻麻的住址。

雖然停留的時間短暫，阿列克謝耶夫還是能夠經由觀察而得的資料來學習。這當中，「庸俗」主題的定義首次成形。他自己承認對「庸俗」的理解是非科學的，然而它在當時卻是必須研究的現象。在此援引一些阿列克謝耶夫的手記：

值得注意！「庸俗」是個純粹民族學的現象。慣用公式：挪借或者租用的世界觀；以大量不明智的價值觀來運作。籠統的邏輯判斷（不去反覆重讀它們）。但這就是體制。值得注意！需要研究。

大眾的生活並非是單一的，它是由空洞合音與現實物質所組成。民族誌的偉大任務在於了解生活在中國的大眾語言，而所謂官方正統的新中國，或許比所有正對中國而言是新的還要不新……少了專制政權就不會生活，只會發牢騷與低聲抱怨。所有舊的都是美好的，所有新的全是可怕的。

值得注意！新的庸俗沒有比舊的庸俗好。人們的生活型態 (Modus vivendi) 並沒有思考的習慣，但卻對所有一切品頭論足並……創造了大眾生活。領導者號召工作，得到的回應卻是懶惰、保守、不願意從輕鬆的日常生活中走出來投入勞動建設。對領袖的崇高浪漫精神的回應是喊喊口號的舊庸俗。

但領導者也沒好到哪去，嚴酷待人卻寬於律己。震天價響的口號、絡繹不絕的宣傳代替了勞動。……言行不一。打開美洲國家的窗口。他們嚴肅地認爲

到了美洲國家就不會有聰明人了……時髦占有一席之地：時興的作家、演說家等等。

如此一來，在歷史上與邏輯上新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破壞性的力量強於建設性的，這道出了歐洲精神。價值觀的重新審視顯示出的情況並非是新的，那帶來的是不相稱的協調 (диссонанс)，而非新的體制，而「新中國」也絕不像「新日本」一般，將自身與新體制接枝在一起。畢竟這個新中國，是通往下一步混沌時期的混亂過渡期……一點也沒有完全不留痕跡地擺脫了「舊中國」，而且根本什麼也沒有來到「新中國」。所有東方與西方的元素共存於一片混亂中——亦和平地、亦鬥爭地。由此可見，「新中國具有舊的+新的=共生」，是折衷的變形。

「流連於」純粹舊中國的浪漫主義者是可笑的，或者可說在所有情況下是帶科學性的危險。對我們哭喊中國古典主義將不會滅亡。虛情假意！傾頹的文化並不會比羅馬的與希臘的自身的文化墮落可怕，更不用說埃及的了。

但民族體系並不如意志堅強的，抑或甚至是飽經風霜的結構體一樣可以因大屠殺的方式而快速地陷於潰敗。在所有他者被研究之前就必須且盡可能地掌握清楚這一民族體系。……研讀民族誌之際，著手從事所謂原始民族的研究，應該是為了接下來能研究在世界史中大量的民族。民族學最近的趨勢——其所研究的是在個體的、群體的，以至歷史的全部進程中的意志行為中，非獨特生活環境的反應。研究只為了活著的人類的生活型態，且從領導階層與隸屬他們的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就是一種庸俗〔？〕（當然，非學術專有名詞）。研究庸俗有那麼點像是一開始從廣播發射的個體，或是一本書中收集休閒娛樂的各種因素。

在一九二六年炎熱的夏天裏，阿列克謝耶夫來到了北京，他聚精會神地旁觀細究「新與舊的群體」，不放過任何與極端不同的人們交談的機會。從日記中的紀錄可見，他不管跟誰都能天南地北地聊，而且不可避免地就把話題引領至舊與新上。在一個典型的中國翰林學究家中，他們談到了「人的淵博學識與智慧有兩個根本：必須有『德』〔？〕」。阿列克謝耶夫把這個儒家的專有名詞譯為「完善的道德」，並視其為「所有學習儒家〔思想〕者，志在反對卑鄙下流的與罪孽深重的庸俗」。

在阿列克謝耶夫的詞彙中不只一次地提到「平庸鄙俗」的同義字之一：「愚昧傻氣」(недоумие)。這是一個過時的詞彙，但是可惜的是，從我們日常生活來看卻

是一個漂亮且意義豐富的詞彙。《當代俄語標準字典》(*Современ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稱此詞彙為陳舊過時的，而使用的例句則出自赫爾岑 (А. И. Герцен, 1812-1870) 《往事與隨想》(*Былое и думы*) 中的引文：「『愚昧傻氣』之所以是一種久治不癒的慢性病，就在於人類……較少理解『簡單』，卻準備相信……他們能夠明瞭非常複雜的東西，而且是完全無法理解的東西。」這正與阿列克謝耶夫對「庸俗」的見解一致。愚昧傻氣亦包含庸俗在內，而若要從這一方面作為研究結論，那麼或許就可以不用到中國，反正祖國的學術活動環境氛圍，已經提供了許多可以相對應於中國狀況且增強說明的豐富材料。在一九二六年阿列克謝耶夫筆記裏的研究結果，與當時蘇聯境內的狀況可以相互比較，如同是某種言外之意。

一九三五年在蘇聯科學院為紀念無產階級革命第十八週年的創作會議上，阿列克謝耶夫這種言外之意已經成為公開的發言文本。十一月五日，阿列克謝耶夫舉行了一場即便是和他親近且友好的人也都會迴避的演講（而不親近友好的會豎起警覺的耳朵，想當然耳，設下圈套），名為「革命、戰爭與庸俗」。當熱衷於自己祖國的庸俗現象之時，身為漢學家的阿列克謝耶夫彷彿把中國拋諸腦後。庸俗是國際性的（這點他不只說過一次），但是置身其中有那麼一點更能感受這種切膚之痛。「因為科學院正進行對金屬³的腐蝕物與各式害蟲的鬥爭，而且對另類秩序腐化的鬥爭則將矛頭指向科學院的特定人士」。「在演講中，阿列克謝耶夫將庸俗稱之為社會秩序的腐蝕物（也就是害蟲和蝨子），刊登於下面的文章中」。而由於在當時必須遵守法律的約束力下，阿列克謝耶夫的演說必須以頌揚蘇聯政府與領導人作結（但卻不能直呼領導人尊貴的名諱），因此他利用行距間的空白補上結語：「不過，蘇維埃中國在這樣的趨勢中為其餘的國家上了充裕的一課。」在文章的手稿上，這句按著自己天真的笨拙寫出的動人恭維，是以緊密的字跡添寫上去的。顯然，阿列克謝耶夫是在重讀之後，才赫然想起疏漏，而插入「不過……」這句話；可以說，這是拿出雨傘來做避雷針的效果。

當然，雷聲並不因此而減緩轟隆作響。在不時出現針對阿列克謝耶夫的告密信中，東方學研究所學術書記哈桑·穆拉托夫 (Хасан Мурагов, 1905-1942) 寫道：「他在東方學研究所與社會科學部的領導機關辦公室發表的五篇論文中〔編者註：其中包括下面摘錄的文章〕顯示了……偽科學的，內容全是精神『辯』態〔編者註：可

³ 譯者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將國家形容為一臺龐大的金屬機器。

能是筆誤，抑或不是〕⁴，以及明顯有害的政治傾向。……在這些作品中，研究員阿列克謝耶夫竟意圖以『庸俗』作為科學研究對象，把中國人民及習俗視為酷愛殖民主義的極端保守分子。」標明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文件，被送往全蘇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 (ЦК ВКПб)，副本則送交科學院副主席克爾日扎諾夫斯基 (Г.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1872-1959)。

現在邀請讀者來玩猜謎的智力遊戲：在下面阿列克謝耶夫的論文中，尋找鄙視中國人民及其習俗的字眼，哪怕是只有一個都可以。而且也可同時在這個衣冠禽獸⁵面前來定義，什麼叫「酷愛殖民主義的極端保守分子」。

—

好像從未有人將「庸俗」列為一個詞語；是不是考慮將它視為一個複合的、口語的、具多重解釋狀況的符號？是否正如我以一種全然符號標誌出的專有名詞方式來建議，就是一個最高等文化的基本元素在最低等的文化裏產生某種退化的明確概念，而且連這些高低文化的基本元素中的相對事物都包括在內。如同我一再重複，不將此歸納為一個詞，而有一點必須且現在就認識清楚：這「庸俗」，已經再也不能將它排除在下列的社會學科之外，如社會學、民族學、文藝學、歷史等等，特別讓它為文學小說潤色，從中可以透露出的，更準確來說是情感，而非思想與意義。

庸俗無疑地存有一種規律性的現象，且由於此字被限制於本身的負面特性，故必須與這個字鬥爭，因此僅靠一種先驗的情感是不足的；需要了解庸俗，其限制在局部制止其蔓延，然後據此得出某些結論。就像在所有其他的科學研究裏，一個觀點從誕生到衰退現象的發生會被通盤地調查研究一樣；而在我們社會學科中，必須將衰退的階段引領至它所應處的位置，以便讓研究過程能涵蓋所有社會生活的情況。更重要的是，當談到具高度文化的民族，他們的文化有著自己型態的生成與衰退，其璀璨與庸俗在自己歷史的縱橫空間中不停地輪替更迭。

⁴ 原文為 психо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ий，俄文沒有這個字，正確拼法應是 психо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ий，意思為精神變態。底部畫線的部分是編者所加，其說明頗有暗諷當時書記的教育水準遠不如科學院的研究員，卻必須承擔審查責任的意味。

⁵ 譯者註：指上一段的東方學研究所學術書記哈桑·穆拉托夫。

二

我認為在同意這樣的論點下可以確定，在中國，這種雙重的發展過程並非是特例的自我存在。同時亦可確信的是，典型中國形式的思想、文字和社會現象在誕生的同時，亦伴隨著在庸俗中的衰退。庸俗是無時無刻且無所不在地占據了，而且較之於獨特的個別現象、思想及文字都還要更涵蓋了無可比擬的寬廣範圍。這些中國形式的誕生，其本身的發展進程，在本質上不就正總是為反對那些已經過度地深嵌和侵蝕文化整體的庸俗退化，而自身帶有論戰性質與明確目標的特色。因此，不見得能夠懷疑儒家所有純粹的有論戰特性的志業學習。這些志業學習乃是為反對人類關係中荒誕不經且罪孽深重的庸俗粗鄙，而這使所有語言消失到達下面這種程度：就是所有語言完全不再能表達清楚是否反對犬儒主義和各式各樣其他的社會腐敗墮落與劣質退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其他的流派中正有這種與庸俗腐化的鬥爭被挖掘出來，引領著道家轉向趨進於所有文化的、人類的，特別是社會的庸俗腐敗，其價值觀如從自然的呼喚與某種世界的準則中避世，謂為「道」也。正如佛家突然間奮起，擺出反對中國生活中庸鄙形式的窮兵黷武姿態一樣，反對在中國生活中所有準則的墮落，而且永遠充滿著可笑和鬱悶的混亂。

在符合常規的、相互輪替的秩序裏，中國的庸俗猶如鐵鏽般腐蝕所有光鮮亮麗的表面；或是儒學的、或是道家學說的，抑或是佛教的。這些儒、釋、道的學說將自己手中堆積如小山谷的食物交付給如此的庸眾生活，不允許他們在這般多重階級與各種階級間的生活裏接受教育，或是產生具獨創性的形式，吸收文化，但卻不是創造文化。

或許存在著一件艱困的事情，在此我們專注於羅列所有這些在庸俗退化中曾經、已經和正在腐敗墮落的中國文化架構的大綱。然而，為表現我所提出來的論點的例證，我將援引幾個首次碰巧發現的例子。

三

如此一來，以理想之人〔譯者註：君子〕的理想處事方法，也就是結合言行與人際關係的感覺，來學習儒家之「禮」。這種儒學學習的腐化變質，在於著名的且令人厭惡的中式繁文縟節上。從這一點來看，中國人自己在生活中也感受到如同蛙

蟲侵蝕的精神折磨，而歐洲人看來卻覺得可笑的，已成了中國人的悲劇。眾所皆知，中國不曾且至今也尚未能從這些庸俗迂腐的戒尺（嚴厲的政體制度與準則規範）中解脫獲得自由。然而值得比較的是，只要將原文中被增強的理想，把它放在歷經純粹庸俗的日常生活中必須的實踐裏，使它們之間的所有差異得以顯示。並且可以證實，研究中國應該超越一個「禮」的理想，同時還得將所有其餘地方性的諷刺性漫畫與外國的起源納入考量中。民族學正是必須對這些複雜的社會腐化型態進行學術的分析，找出這些型態的適當典型，及其所占的地位；而非只局限在民族學內最鍾愛的天真想法中。庸俗當然並不是粗俗愚蠢（即使，最終仍是理所當然地無法擺脫這個元素），況且可以這麼說，以公式化的方式繼續來研究它已經是不值得的了。

一切亦是如此眾所周知（如果繼續列舉一系列的例子），正如政客（或者是總督）在所有一切以儒家、甚至是以它的宗派來運作的生活內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就是在所謂的（以歐洲人的說法）科舉中腐敗墮落（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是在庸俗卻是「清醒的」侵略者壓力之下；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亦是來自於這般庸俗卻是「清醒的」中國皇帝的壓力之下）。在這科舉制度中不是讓賢能者出列，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庸俗的讀死書的人，在這些國家最高考試中練習著刻板八股，任由善於鑽營且庸俗的瘋狂者取代思維能力強的思想家⁶。

賣官位給不學無術之人的這種制度早已世界聞名，從最根本扭曲了整個中國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儒家體系。卻鮮少人明瞭，儒家體系在中國已經近乎病態地逐漸弱化了那些不傾向庸俗的人們，而儒家的中國文學，想當然地映照了這個現象。

但是，在中國的文學自身竟也已久浸於庸俗的腐蝕，重複地演奏一切老掉牙的形式，而無法堅信創作。

還有所有的中國藝術，數世紀以來也都拘泥於死氣沉沉的華美莊嚴，無止境地重複於固定模式，且在庸俗的形式中勉強只有寥寥無幾的藝術作品能展現出生命特徵。因此，出現了大量描繪王室財富的極其庸俗的畫作；雕塑品製造出喪失所有與

⁶ 這種不正常的「八股創作」的例子，部分可參閱我的著作《關於詩人的中國史詩》（*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Петроград, 1916, с. 052 сл.）。《聊齋》短篇小說（請參閱我的翻譯）中充斥著對中國科場庸俗的憤慨。編者按：阿列克謝耶夫在自己翻譯的《聊齋》中，第280頁的第20個註解內解釋了這個情形。更為詳細的例子，亦可參閱最近幾年出版的、由阿列克謝耶夫翻譯的《蒲松齡》（*Пу Сун-лин*）（СПб, 2000）。舉例而言，短篇小說〈司文郎〉（*Министр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可以作為中國科場庸俗的典型。

生命的精神符號連結的畸形人物，而致使一千五百年前的藝術能光輝燦爛；建築早已流於過分的華麗矯情且充塞冗贅，將原本雄偉莊嚴的原創排擠出去；戲劇迄今仍無法走出所謂「古典」的、金玉其外的傀儡狀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四

非常清楚地，庸俗本身在其自身內，但卻也在其他的、僅僅於文章與形式中。雖然歐洲殖民主義者在所有其他的東西之前已先嗅出了中國庸俗的味道，但是他們學者的與文藝理論家的密使們迄今在自己的書籍、文集與論文中卻信口雌黃地討論庸俗像是討論中國文學的原樣一般。實則，現在不是正該結束這一切的時候了嗎？

的確，歐洲人對於中國庸俗腐化在許多事情上的反應曾是新中國最主要的導師，而創建新中國的革命家是學了歐洲本事的孫逸仙、梁啟超（任公）等人。這些人既是中國的舊學者，同時又向中國長久存在的庸俗腐敗宣戰。儘管如此，他們意指的庸俗腐敗卻十分地五花八門。例如，從某一角度來看，彷彿缺乏愛國主義；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又顯得鍾愛沙文主義。顯然地，對他們來說，要在類似於無政府的基礎之上來戰勝庸俗是很困難的。於是，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他們的武器會迅速地從所有各式各樣的無賴騙子的手中掙了出來。這些人一方面向舊中國宣戰，同一時間又挑戰那些相對於舊中國的新歐洲主義。他們迅速地抓住時機並攀登至另一個統治階層。因此，既不始於舊中國，亦非來自歐洲。換言之，新中國也就是從那些庸俗又不學無術的人手中產生，邁向世界的生命。可想而知，它的誕生在當時是困難的。

五

在這種情勢下，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的誕生，可被稱之為「油煎包子裏什麼內餡也沒有」⁷，就是一種虛有其表。這樣的革命來自介於自身為半中國人與半歐洲人之間的差勁合體，且尾隨著一切有關於時代與環境所附帶的修正訴求；在大多數的時候，重複著自身週期性的且幾乎是十分規律的在王朝與無政府狀態之間，

⁷ 俄語俚語“Пирожок ни с чем”。

一個接著一個地更迭變換。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個革命都缺乏基礎主軸與旗幟。它從來都不是源自於有組織的群眾，而且在本質上，不會與群眾對談交流。這些從少年時代起都是不學無術的軍閥們，對所有人的霸道擄掠，從革命初始就以民眾請託之名而起義。到這個階段為止，這現象的出現，只要是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熟知。而且說實在的，現在中國國內（並且不只在中國國內）都想將這個時期劃入現代中國歷史的分期中。然而，伴隨著革命，所有舊中國文化（古風習俗、儒家歷史的道德規範、士大夫等等）的標題、標語與口號，（在一些微弱的抗爭中）迅速且徹底地煙消雲散了，特別是新學派不支持舊有文化，而新一代，可以說，對這些舊中國文化的標題、標語與口號全然陌生。一時看來，似乎與舊中國的原汁原味（例如：儒家與道家的規範）為伍將會被拋棄，而且庸俗腐敗的蛀蟲就盤據在這上頭。亦存在另一種情況則是：如我先前所說，庸俗腐敗在革命中如燎原之火般地蔓延，與之掛勾，然後完全駕馭著革命，從中拔取武器，但卻僅僅在庸俗自身的目的之內，變成好勇鬥武。

如此一來，庸俗以自身環境的力量迅速地擺脫了中國文化之內，中國與歐洲元素之間對比關係的問題，而這問題折磨著許多敏感且嚴肅的人們。於是突然之間，一切變得清楚無比，所謂西方——就是唯物主義者、力學專家，僅此而已；然而，東方（此指中國）的一切充滿了大量關於人類幸福的理想宗旨。意思就是，要是我們從他們身上取得他們的大砲和時鐘，就得向自己的道路——有原創性的理想——投降。如此一來，儒家古老迂腐的沙文主義改頭換面成了一個嶄新的、時尚的樣貌。與此有所不同的只是，舊的不學無術之人熟知，該為儒家古老迂腐的沙文主義辯護，那麼就如新的不學無術之人一樣，總要帶著別人的嗓子拉長聲音唱著自己的詠歎調。如果這些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該明白他們不過是在自己的演講廳內發號施令而已。社會的上下階層表現出諸如此類孱弱無力的沙文主義。正如其中一位總統徐世昌認為，必須在歐洲刊物上發展這種觀點（請參閱我在《東方雜誌》上的評論）⁸。

在刊物上開始一一出現要爭取「科學方法」、「組織一切」、「打倒舊俗」、「自由戀愛」等等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卻一點幫助也沒有。外來詞，如密斯忒(Mister)、

⁸ Алексеев В. М. “[Рец. на:] Hsu Shih-Chang (вместо Su Cheu-Tch’ang — Сюй Ши-чан).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La Chine après la guerre. P., 1992,” *Восток*, кн. 4 (1924), с. 194-195.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賽因斯 (science)，是十足地多餘，為賦新詞強以中國文字造字。這些外來語大量滲入所有故作斯文的假紳士們的談話中，尤以自命為先鋒分子和中輟某些學習的大學生為最（按胡適教授的說法，他們是一群「頭腦不清的烏合之眾」）。在全然不正常的氛圍與局勢底下，歐洲主義橫行於革命的中國。人民的選擇喪失所有標準，外來物以一種無政府主義潮流的方式如洪水般大量湧現；沒有任何抵擋、底線，也缺乏評判與遠見，是庸俗而未經深思熟慮的。報紙變得寡廉且鮮恥到極致，其態度尤勝過西方媒體（在廣告與誹謗文章中尤其明顯）。文學作品突然盡心竭力地模仿一切過時的歐洲派別，以時代錯亂的方式將這些學派混淆為一堆，然後出版這一堆散發腐臭氣味的、全然的庸俗物品。偶然的成功創造出的潮流成了頂尖首要，而當然地，共同的驚慌失措、沮喪、悲觀主義、以眾多「國恥」為由，錐心刺骨的激昂話語占據了所有舉目可及的文學空間，亦擴及至藝術，以及社會生活中。甚至有刊物歪曲任一事物到一種不可思議的背離常規的地步，因此令人難以找到最初起源的特點風格。

六

一九一七年胡適（胡適之，1891-1962）這位未來將成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的學生返回中國。在此之前，他已經從美國發出宣言，提倡將中國文學從千篇一律的文言文霸權中解放出來。他並比照歐美的原則，專斷地宣示以白話文為文學中唯一被容許的語言。我認為，這位二十五歲的哲學家，易於熱中任何事情，接受良好歐式教育，但卻非歐洲迷或親美分子，而且他對於革命時期的中國（上海）所做的特徵描述十分有趣。因此，我決定將它毫無刪減地翻譯出來，只附上些許註解，並且那些為了增添畫面豐富度的無關緊要的敘述，我亦認為沒必要刪除。

胡適「歸國雜感」⁹：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個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

⁹ 譯者註：除了文中幾個詞語、字句的中俄翻譯值得商榷，或者沒有譯出之外，阿列克謝耶夫的翻譯基本上採用意譯，已恰如其分地呈現出來。

著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它了，所以它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它正在那裏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這話並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並不曾懷什麼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勳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臺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臺¹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臺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這裏面的座位和戲臺上的布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腳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臺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裏去了呢？你再看那臺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布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快馬加鞭，卻忘記了臺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齣《四進士》。臺上布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杰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小舞臺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布景，卻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臺」的紙煙，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炮臺」紙煙還不算希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 A, B, C, D, 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的 A, B, C, D, 又那樣蠢呢？我想這裏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炮臺」那樣

¹⁰ 阿列克謝耶夫翻譯成「大劇院」(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

中吃罷？A，B，C，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中王陽明占了四大頁，〈洪範〉倒占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¹¹ 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蕭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中蘇蕙的迴文詩足足占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入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以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拿《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些什麼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人》、《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摺華》，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傳》，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

¹¹ 「戲曲」翻譯為「抒情的戲劇」（Лирические драмы）。

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 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 Chekhov 和 André Gide 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係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是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鵰」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摺華》，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人》，不如用 Bernard Shaw 的 *Androcles and The Lion* 或是 Galsworthy 的 *Strife* 或 *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¹²。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裏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は搭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洋鈔跌價。因此

¹² 阿列克謝耶夫採英文翻譯方式譯成俄文：“Time is not money” 譯回俄文：“Время не деньги.”。

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自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銅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裏和窮人家裏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種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¹³，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¹⁴。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课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裏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於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裏找一個會吹笛子的唱崑腔的人來教？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地常說：「列位辦學堂，儘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譬如我們這裏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

¹³ 此句俄文譯為「醫貓醫狗者皆可醫人」。

¹⁴ 這一句並未翻譯成俄文。

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需要注意課程的實用。儘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需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於那些中學校的成績，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的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¹⁵。這都由於學校裏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帳房，警察，兵士，農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了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卻並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作《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七

如各位讀者所見，如今早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胡適，他的這篇簡短速寫

¹⁵ 此句譯成：「非誇讚，亦非詆毀，這些中學堂畢業的人才，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

確然提供一幅相當淒涼的庸俗寫照。自革命後七年，這樣的景象仍主宰著中國。當時他自己未必見得明白（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明白），這種類型的革命（1911年）只能是無政府狀態。儘管如此，他大概認為，在訴苦、疾呼與起誓的同時，他將能引領革命走向真正的勝利。

革命至今尚不足二十年，中國一如從前仍困於死胡同中。這裏是亞洲還是歐洲？中國是否為國際社會（不只是國際聯盟）的一員？抑或只是個地形的聚集體？這些問題使得「無舵無帆」一路從君主帝制踉蹌至共產主義的中國輿論界坐立難安。

有一點是清楚的：習於庸俗且讓庸俗主宰數世紀之久的中國，已然讓庸俗腐蝕了君主帝制的與革命的中國。庸俗還能夠在所有的環境下稱雄稱霸，甚至是在偉大文化高度發展的能見度底下，類似我們今日所察覺的那樣狀況下¹⁶。

缺乏基本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的（革命不可能有其他的）翻修重建，來將庸俗連根拔起，也就斷難允許錯綜複雜的文化有機體，這個因歷史形勢與歐洲主義盤根錯節而使最新疆界更加複雜的文化有機體，在它不遠的將來裏飽受威脅的危險性中勝利地走出來。這危險性，不僅是外交政治的，亦是內政問題的，存在著害蟲與鏽蝕物。不過，蘇維埃中國將在這個方向上給予其他足夠的教導¹⁷。

¹⁶ 諸如此類者，例如：中國研究科學、出版與所有其他文化產品的繁榮興盛。

¹⁷ 譯者註：如編輯所言，這是阿列克謝耶夫後來硬加上去的句子。